

移民问题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的崛起*

陈文胜

内容提要 当今,西方国家和地区种族色彩浓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勃兴,折射出时代之变、西方之变,对全球政治走向产生重要影响。而移民是解释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瑞典,移民和种族问题正在成为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的一部分。近年来的选举结果表明,瑞典民主党已经成为该国国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它通过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政治策略在选举中取得了持续成功。这些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它将外来者当作“替罪羊”贴上社会问题的标签,“种族”“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成为排外的意识形态或话语,反映和迎合了国内公众日益高涨的反移民情绪。事实上,瑞典民主党的成功取决于对移民议题的掌控和炒作。在瑞典移民的新动态和新问题驱动下,民族主义政治、排外政治、恐惧政治、媒介化政治、父权政治等在移民框架下融为一体。瑞典民主党的崛起也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一部分,它隐喻着整个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主流化”和“合法化”的趋势正在普遍出现。深入探讨移民和瑞典民主党崛起的共轭发展关系,能够为认识当今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态势提供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 移民 右翼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 瑞典民主党

一、前言

近年来,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希腊、芬兰、挪威、瑞士和荷兰等国家广泛崛起。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发展和成功源于欧洲政治和福利国家中的民族主义和反移民议程的强势出现。在瑞典,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的日益成功正反映了这种政治发展趋势,而“移民和反移民被普遍认为是理解最近极右翼政党崛起的民粹主义层面原因的关键”^①。极右翼政党通常被视为“反移民政党”。正如西方著名的民粹主义学者卡斯·穆德(Cas Mudde)所言,对于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而言,“本土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是其意识形态的核心特征”^②。瑞典民主党是一个带有右翼元素(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仇外心理、安全)的民粹主义政党,它正是通过民族主义和反移民策略在近年来的选举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些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内高涨的反移民情绪。当前,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政治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纲领中盛行,导致一些学者将移民怀疑主义、仇外心理或种族主义视为民粹主义政党在许多国家出现并

*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交媒体时代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传播与影响研究”(22BZZ08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感谢外审专家和《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提出的修改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① Andrej Zaslove, “Closing the Door? The Ideology and Impact of Radical Right Populism on Immigration Policy in Austria and Italy”,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9, no. 1, 2004, pp. 99 - 118.

②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6.

站稳脚跟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①

瑞典民主党的民粹主义是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运动谱系的一部分。就像其他地区一样,在瑞典,“激进右翼”立场“主流化”和“正常化”的趋势正在出现。瑞典民主党的选举胜利意味着瑞典作为欧洲“例外论”的终结,反映了它在政治上的巨大成功,这同时也激发了学界对该党越来越多的分析和兴趣。正像克里斯蒂安·诺赛尔(Cristian Norcel)所言,“一个植根于民族主义环境和白权运动的边缘政党,使瑞典成为欧洲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研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②。在以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为特征的瑞典国情和语境中,“种族”“民族主义”“公民身份”和移民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瑞典民主党经常被外界贴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标签。本文从移民问题、移民政策和移民政治框架的视角来探讨移民与民粹主义政党崛起之间的共生与互构的复杂关系,以揭示瑞典民主党的右倾转向、发展缘由及深远影响,更好地把握当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蔓延、发展趋势及影响机理。

二、瑞典民主党的发展及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瑞典民主党是一个民粹主义的反移民右翼政党,在过去十年中崛起。在瑞典民主党崛起之前,该党在政治中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事实上,该党起初发展的不成功使其在一些文献中被归类为欧洲的“例外”。^③尽管如此,仇外的反精英主义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在瑞典一直存在,它深深植根于新纳粹言论。相较于其他传统政党,瑞典民主党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政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活跃在瑞典政坛上。该党明确地将自身定位为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它的政治特点是种族民族主义、反移民、渲染大规模风险(社会受到移民、犯罪和社会不安全的威胁)和反精英主义。”^④它利用社会民主主义遗产和具有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话语找到了立足点。处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第三波浪潮中的瑞典民主党,正在成为许多对瑞典政局心怀不满的选民的可行性选择。

(一) 瑞典民主党的历史和现状

要理解瑞典民主党在政坛崛起的动因,首先需要追溯该党的历史。瑞典民主党通常被认为是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家族的一部分。瑞典历史上有几个政党曾被贴上极右分子的标签,它们大多被描述为破坏性的或公开的纳粹政党,并最终没有一个能够摆脱选举边缘化的命运,其对政局的影响也微不足道。尽管瑞典进步党早在1968年就成立了,但它的成功仅限于一些偶然当选的地方议会代表。此外,民粹主义分离主义政党在20世纪80年代在地方议会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在国家一级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随后,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民粹主义政党“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在1991年正式成立,但在1994年的选举中,该党只获得了1.2%的选票,并于2000年解散。尽管这些民粹主义政党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反映了极右观点和种族主义活动在瑞典的逐年增加。

瑞典民主党成立于1988年,是瑞典党和新民主党的继承者。然而,直到进入议会之前,它都被

^① Subrata Mitra, “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 A Single-issue Movement?”,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1, no. 2, 1988, pp. 47 – 64.

^② Ov Cristian Norocel, “Åkesson at Almedalen: Intersectional Tensions and Normalization of Populist Radical Right Discourse in Sweden”, *NORA-Nordic Journal of Feminist and Gender Research*, vol. 25, no. 2, 2017, pp. 91 – 106.

^③ Jens Rydgren, “The Radical Right and the End of Swedish Exceptionalism”,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vol. 18, no. 3, 2018, pp. 439 – 455.

^④ Bo Nilsson, “An Ideology-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Policies of the Sweden Democra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 28, no. 5, 2022, pp. 622 – 634.

其他主流政党和主流媒体忽视。在早期,该党是国家和地方政治中的边缘力量。它于1991年首次赢得政治代表权,拥有两个市议会席位。直到1998年,该党在全国的选票份额仅为1个百分点左右。2001年,该党分裂,一些强硬派成立了国家民主党,而瑞典民主党则通过不断增加选民份额,并在全国大选中获得2.9%的选票。在2010年的选举中,该党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获得了5.7%的全国选票,在议会中获得了20个席位。在2014年的选举中,该党的支持率从2010年的5.7%上升至12.86%(见表1)。^①2022年,该党以20.5%的支持率成为瑞典第二大党,这成为瑞典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如今,该党已从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治弃儿”走向政治中心,给政局带来深远影响。

表1 1988—2014年瑞典民主党选举结果(单位:%)

	1988	1991	1994	1998	2002	2006	2010	2014
投票支持率	0.02	0.09	0.25	0.37	1.44	2.93	5.70	12.86
议会席位	-	-	-	-	-	-	20	49
地方议会席位	0	2	5	8	49	266	612	1324

资料来源:《瑞典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对老牌政党及其议员移民议程的影响》。^②

(二) 瑞典民主党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瑞典民主党脱胎于新纳粹和新法西斯主义。自2005年吉米·奥克松(Jimmie Åkesson)当选该党主席以来,瑞典民主联盟经历了一场意识形态变革,目的是加入议会政治,实现民粹主义激进右翼话语的正常化。瑞典民主党声称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保守党,并将价值保守主义和维护团结福利视为实现良好社会的最重要工具”^③。该意识形态以单一文化的民族主义元素为特征,其政治议程中突出对欧洲一体化政策的批评,同时在言论上坚持较为传统社会民主与保守主义思想。这些思想从属于“真正的瑞典人”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该党具有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主张反移民、反女权主义、文化同质性和民族纯洁。该党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关键思想是,必须保护民族文化免受其他文化的影响,以避免灭绝的风险。它指出,“一个种族和文化同质化的国家比一个多元文化国家的形成具有更大的和平发展潜力”^④。

欧洲极右势力的核心特征是本土主义,即视每个国家为其特定民族社群的家园,并且常常强调这些民族社群正面临威胁或处于濒危状态。右翼民粹主义具有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基本特征,这意味着强烈的仇外心理、对社会文化事务的威权主义观点,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民粹主义风格。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正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和反对移民以及多元文化、多民族社会的主张基础之上的。正如埃克曼(Ekman)所言:“移民在话语上与民族和民族国家、社区和归属感、文化、宗教、犯罪和性暴力等特定建构和更广泛的主题(或论点)相关。”^⑤这些右翼政党通常以四种不同的方式将

^① Niklas Bolin, “The Impact of the Swedish Populist Radical Right on the Immigration Agendas of the Established Parties and their MP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 no. 3, 2017, pp. 325–350.

^② Niklas Bolin, “The Impact of the Swedish Populist Radical Right on the Immigration Agendas of the Established Parties and their MP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 no. 3, 2017, pp. 325–350.

^③ Ann-Cathrine Jungar,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the Nordic Region: A New and Distinct Party Family?”,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vol. 37, no. 3, 2014, pp. 673–685.

^④ Per-Erik Nilsson, “‘Shame on the Church of Sweden’: Radical Nationalism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ontemporary Sweden”, *Critical Research on Religion*, vol. 8, no. 2, 2020, pp. 138–152.

^⑤ Mattias Ekman, “A Populist Turn? News Editorials and the Recent Discursive Shift on Immigration in Sweden”, *Nordicom Review*, vol. 42, no. S1, 2021, pp. 67–87.

移民视为问题并进行话语建构的:第一,移民是对民族认同和自由价值观的威胁;第二,移民是犯罪和其他社会不安全的主要原因。瑞典民主党的官方刊物(*SD-kuriren*)网站经常刊登有移民背景的人所犯罪行的报道,试图塑造移民是犯罪主因的形象;第三,移民是争夺工作和住房等稀缺资源的非法竞争者,也是失业的原因;第四,移民是西方福利国家慷慨施舍政策的滥用者,导致了国家对“本地人”补贴的减少。

在上述移民问题中,前两个问题可以被视为民族主义学说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不同的民族不应“混合”,以免文化特性消失,不安全感 and 犯罪增加,而后两个问题被视为福利沙文主义学说的一部分,描述了移民和“本地人”竞争有限的经济资源。移民被描绘成非法的竞争者。瑞典民主党将执政的中右翼联盟等主流政党视为意识形态对立的极端政党。奥克松指责道:“当选民认为移民是最重要的问题,但他们不同意,相反,温和派站在转向我们的一边,而在另一边,我们则有一个非常极端的支持移民的政党。”^①经过瑞典民主党一系列反移民话语的建构,“以前极端的、不能被接受的政治观点已经成为主流政治话语的常态化元素”^②。与瑞典民主党活跃的反移民政策宣传和话语构建相反的是,瑞典主流政党则显得理念陈旧,政策固化,“很少关注移民问题,并选择了不屑一顾的战略”^③。这使得一些民众“对主流政治机构、政治精英或国家大方向不抱幻想”^④。这也为瑞典民主党的话语构建及其成功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机会。

瑞典民主党以民族主义仇外心理为基本理念,具有强烈的反移民、反对多元文化社会、反政治机构这些民粹主义特征。该党一直保持着鲜明的民族主义基础,民族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是该党自诩的两大意识形态的支柱。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通常包括把国家作为一个文化集体的观念,一个拥有共同的习俗、习惯、价值观、语言、宗教、服饰、角色和关系等的个人团体。瑞典民主党本身将民族文化定义为:“团结一个社会或某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因此,它包括语言、行为方式、习俗、制度、艺术和音乐、服饰、宗教、仪式、游戏、价值观和规范法律和道德体系,等等。”^⑤这种民族文化被认为是人类生存最基本和最古老的基础。而移民被认为是一种集体的消极身份和价值观,威胁着同质民族国家,造成犯罪和对瑞典多数社会的破坏。瑞典民主党声称,“国家是仅次于家庭的最重要、最古老和最自然的人类社会”,因此,国家利益应该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⑥

三、移民问题与瑞典民主党的反移民政策

移民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性特征。作为极右翼政党的瑞典民主党通常被理解为“反移民政党”,“反移民政策是瑞典民主党政治纲领的一个核心”。^⑦该党专注于瑞典的民族认同和人口构成,其政策主张不仅受到仇外心理和对移民的顾虑驱动,同时也对主流政治持有批判态度。它坚决

① Mats Ekström,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in News Interviews: a Study of Journalistic Reporting on the Swedish Democrats”, *Social Semiotics*, vol. 30, no. 4, 2020, pp. 466 – 484.

② Mats Ekström,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in News Interviews: a Study of Journalistic Reporting on the Swedish Democrats”, *Social Semiotics*, vol. 30, no. 4, 2020, pp. 466 – 484.

③ Carl Dahlström, “The Immigration Issue and Anti-immigrant Party Success in Sweden 1970 – 2006: A Deviant Case Analysis”, *Party Politics*, vol. 19, no. 2, 2011, pp. 343 – 364.

④ Jamie Bartlett, *Populism in Europe: Sweden*, UK: London, 2012, p. 45.

⑤ Ann Towns, “The Equality Conundrum: Gender and Nation in the Ideology of the Sweden Democrats”, *Party Politics*, vol. 20, no. 2, 2014, pp. 237 – 247.

⑥ Ann Towns, “The Equality Conundrum: Gender and Nation in the Ideology of the Sweden Democrats”, *Party Politics*, vol. 20, no. 2, 2014, pp. 237 – 247.

⑦ Ernesto Dal Bo’, “Economic and Social Outsiders but Political Insiders: Sweden’s Populist Radical Righ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90, no. 2, 2023, pp. 675 – 706.

反对瑞典成为多元文化国家,并严厉批评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积极表达他们对移民和种族多样性的不满,建立起反移民政治的政治议程。虽然瑞典民主党未能完全阻止移民或不实施强迫遣返,但它们影响了瑞典政府有关移民、融合和犯罪的话语和政策,使政府以更严厉的限制,将种族化的他者构建为对瑞典的威胁。

(一) 移民概况

瑞典是北欧对待移民最友好的国家。该国 19.7% 的人口出生在外国,23% 的人有外国背景,是欧洲种族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① 瑞典的移民历史悠久,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在二战后,对移民和难民的开放和宽容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瑞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移民的构成上,最初是由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难民组成,后来由来自东欧的难民、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经济边缘地区的劳工组成。而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初,非欧洲移民的涌入有所增加。但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2017 年,瑞典的大多数外国出生的人来自芬兰。在数量上,瑞典的外国公民比例从 1960 年的 2.5% 增长到 2010 年的 9.1%。^② 1991 年和 2014 年移民的人数出现高峰。在过去几十年里,接受移民和难民是瑞典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近年来,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移民和融合问题在国内政治议程上从一度相对边缘的位置上升到了最重要的位置,现在已经成为瑞典社会公开讨论的话题,人们广泛要求停止或大幅度减少移民的呼声高涨。在瑞典普遍存在着政治化的仇外心理和民族主义,大多数选民对减少迁徙到瑞典的难民人数的想法持支持态度(见表 2)。认同移民问题重要性的人数在 1992 年达到一个高峰,当时 26% 的受访者认为移民问题是瑞典当前最重要的三个问题之一。2015 年难民危机爆发时,认同移民问题重要性的受访者到了 53%。因此,2016 年政府不得不对慷慨的庇护移民者的立法进行修改,使政策变得更加严格。在瑞典,就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出现了将“激进右翼”的立场“主流化”趋势。近几十年来瑞典政治宽容移民的话语开始转向民粹主义话语,包括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中,复杂的社会问题,如失业、住房、社会凝聚力、犯罪等,往往被简化为移民问题,移民成为“复杂问题的简单解决方案”^③。

表 2 瑞典民众对难民和移民的态度(1992—2009 年)(单位:%)

	1992	1993	1997	1999	2004	2007	2009
减少允许来瑞典的难民人数是个好主意	65	59	56	56	54	54	50
生活在瑞典的难民太多了	-	52	48	40	42	39	36
他们不愿意看到亲戚嫁给移民	-	25	18	17	15	14	12

资料来源:《激进右翼与瑞典民主党的终结》。^④

(二) 移民带来的系列问题

2011 年至 2015 年间移民和难民的涌入给瑞典政府带来了人权、民主和融合等重大考验,不同

^① Jimmy Stephen Munobwa, “Diversity Barometer 2020: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tion and Ethnic Diversity in Sweden”, *Social Science*, vol. 10, no. 10, 2021, pp. 401 - 420.

^② Eirikur Bergmann, *Nordic Nationalism and Right-Wing Populist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67.

^③ Mattias Ekman, “A Populist Turn? News Editorials and the Recent Discursive Shift on Immigration in Sweden”, *Nordicom Review*, vol. 42, no. S1, 2021, pp. 67 - 87.

^④ Jens Rydgren, “The Radical Right and the end of Swedish Exceptionalism”,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vol. 18, no. 3, 2019, pp. 439 - 455.

血统的人必须共存。由于移民社区内的派系与当地居民经常发生冲突,这引起了许多瑞典人对移民政策的不满。在公共辩论中,移民一词长期以来与犯罪密切相关。正如安德里亚·塞拉斯(Andrea Cerase)所言:“在民粹主义时代,由于普通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安全,移民和少数民族往往要对犯罪、安全水平差以及城市和社会环境的任何恶化负责。”^①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被认为严重危及瑞典的福利政策和国家安全,另外,“在自由民主价值观(如妇女权利)、犯罪、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经济资源再分配方面,移民都被视为对瑞典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和谐的潜在威胁”。^②对此,瑞典民主党认为,移民的涌入产生了各种连锁反应,从现有福利提供削减到与移民有关的帮派犯罪,都使该国受到了影响。针对不断上升的犯罪率,该党的领导人奥克松指出:“犯罪很多时候是外来移民造成的。……大规模移民使瑞典变得异常。”^③

瑞典关于难民的负面话语以及限制性的移民政策最大限度地归因于2015年的难民危机。随着难民危机的发生,加之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和媒体将移民视为对国家认同、福利制度、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威胁,导致公众对移民和种族多样性的态度普遍恶化。对种族多样性的极端态度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反过来又使民族融合和凝聚力复杂化,导致瑞典政治气候的动荡不安。许多研究表明,移民正面临不同形式的排斥,例如,种族隔离、劳动力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的限制。在移民政治化背景下,以前的移民政策受到了激烈的质疑。移民首次被瑞典民众视为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一些主流政党也不得不改变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采取了更严格的限制政策。例如,2015年11月,瑞典政府提出了一项临时法律,给予所有成功的寻求庇护者临时居留权,但不是永久居留权。

关于瑞典移民问题的形成,可以用林肯·奎林(Lincoln Quillian)的群体冲突理论来作出解释。该理论断言人们是自私的,都想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正是这些利益影响了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彼此的看法。在争夺稀缺资源时群体之间的冲突就会出现,这些资源可以是物质、地位和权力,也可以是文化遗产和价值观的象征性资源。该理论认为移民被视为以工作、犯罪、教育和税收负担的形式威胁当地人的经济和物质利益。^④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对资源重新分配的担忧,可以解释为瑞典民众对移民消极情绪增加的原因。此外,关于安全、文化差异、价值观和情感反应,以及普遍的规范、媒体话语和政治气候也会影响对移民的态度。根据群体冲突理论,在瑞典,基于族裔、宗教、种族等对少数群体的结构和体制歧视,会在大部分人口中引起不容忍。可见,移民问题和难民危机构成了瑞典民主党崛起的决定性时刻。正如安东尼·穆根(Anthony Mughan)所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成功不仅在于他们强调反移民,还在于他们识别那些被认为对东道国社会有害的行为。”^⑤

(三) 瑞典民主党的反移民政策

移民政策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政策领域,因为它并不完全掌握在决策者手中,而是受到国际公约、自然灾害和国际冲突等外部环境的影响。而新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认为,社会政策应该与一个主权民族国家直接联系起来。瑞典民主党比其他北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具有更极端

① Peter Vasterman (ed.), *From Media Hype to Twitter Stor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334.

② Birte Siim et al. (eds.), *Negotiating Gender and Diversity in an Emergent European Public Sphe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91.

③ Isabel Airas, “Contesting and Envisioning ‘Trygghet’: The Sweden Democrats, Social Democrats, and the 2018 Swedish General Election”, *Area*, vol. 55, no. 1, 2020, pp. 26–37.

④ Lincoln Quillian, “Prejudice as a Response to Perceived Group Threat: Population Composition and Anti-immigrant and Racial Prejudice in Europ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0, no. 4, 1995, pp. 586–611.

⑤ Anthony Mughan, “Anti-Immigrant Sentiment, Policy Preferences and Populist Party Voting in Australi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6, no. 2, 2006, pp. 341–358.

和仇外的思想遗产。该党在其社论中曾明确指出,“移民改变了整个瑞典的基础”^①。因此,“它主要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构建政策问题,并与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引起的问题有关”。^②反移民成为激进右翼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和标签。正如埃内斯托·比达尔(Ernesto Dalbo Bo')所言:“反移民政策是瑞典民主党政治纲领的另一个核心。”^③瑞典民主党移民政策集中体现在四个核心文件上:《99条更好的瑞典建议:瑞典民主党与选民合同2010—2014》《瑞典民主原则宣言》《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宣言》《移民减少带来的大笔储蓄》。这些政策文件反映了该党从彻底的种族主义到福利沙文主义、文化种族主义和性别民族主义的蜕变,并成功地将庇护难民和移民的立法推向了限制性方向。

其一,反对多元文化。瑞典民主党抵制多元文化社会,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民族纯洁性。该党严厉批评主流政党宽松的移民政策,认为它支持大规模移民,旨在创造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这破坏了民族文化的特性和完整性,威胁到民族认同,导致了种族隔离、犯罪、冲突和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传统本土文化和精神的丧失。该党围绕穆斯林移民,使用文化刻板印象和生物学隐喻等方式,成功地制造了道德恐慌。在1989年的党纲中,该党致力于保护瑞典作为“一个种族和文化上同质的国家”^④。他们认为,当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生活时社会冲突就会随之而来。它将原住民及其文化与瑞典民族国家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每个民族都应拥有一种由种族决定的文化,瑞典人完全有权将自己的文化和身份与他人分开。该党通过夸大移民和土著居民文化价值观之间的不相容,加剧了选民的仇外态度,以此来获得他们对自己所主张的传统文化规范的支持。

其二,推行普遍的福利沙文主义。福利沙文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策略,而且也是福利国家社会政策背景下反移民态度的一种特殊形式。普遍的福利沙文主义观点是,移民给福利国家带来了过重的负担。移民通常被指责不工作、欺骗和滥用福利国家的资源,对人民家园及当地居民普遍福利带来威胁。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要么完全将移民排除在福利之外,要么尽量减少移民获得这些福利的机会。据一项调查显示,自2013年以来,瑞典的一些受访者认为许多具有外国背景的人会抢占该国的社会福利。瑞典民主党重新定义了普遍福利制度,即该国的福利制度应仅限于“我们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外国人。^⑤该党还指出移民必须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以免威胁到瑞典人民的民族认同、福利国家或安全。例如,该党将自己定位为福利国家的守护者。而事实上,“瑞典福利制度的种族化在其几乎所有核心领域都是普遍的和固有的”。^⑥

其三,推行女性民族主义。如今,“性别已成为民粹主义右翼的一个中心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两性平等和妇女权利已成为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新的总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⑦瑞典民主党将性别平等作为一项关键的民族价值观,嵌入民族叙事中。该党将控制移民问题与确保瑞典妇女在公共场所的安全联系起来。它主要是通过强调男性移民的威胁,或通过针对女性的暴力、性骚扰变成“移民问题”,建立针对妇女的犯罪与移民之间的隐含联系。该党认为非欧洲人和穆斯林对国家特性、社会凝聚力和妇女权利构成外来威胁。穆斯林妇女戴面纱和头巾,强迫和包办

① Mattias Ekman, “A Populist Turn? News Editorials and the Recent Discursive Shift on Immigration in Sweden”, *Nordicom Review*, vol. 42, no. S1, 2021, pp. 67–87.

② Reinhard Heinisch (eds.), *Understanding Populist Party Organis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191.

③ Ernesto Dalbo Bo', “Economic and Social Outsiders but Political Insiders: Sweden's Populist Radical Righ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90, no. 2, 2023, pp. 675–706.

④ Anders Widfeldt, “Sweden: Political Data Yearbook 2007”,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7, no. 7–8, 2008, pp. 1143–1147.

⑤ Jørgen Goul Andersen, “Structural Changes and New Cleavages: The Progress Parties in Denmark and Norway”, *Acta Sociologica*, vol. 33, no. 3, 1990, pp. 195–217.

⑥ Fabio Perocco (ed.), *Racism in and for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p. 97.

⑦ Birte Siim et al. (eds.), *Negotiating Gender and Diversity in an Emergent European Public*,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90.

婚姻等,使她们成为伊斯兰教下的从属地位和性别歧视角色的象征,这也表明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是一个威胁性别平等的存在。该党通过建构威胁瑞典妇女的穆斯林移民“他者”与压迫妇女的“野蛮”他者,捍卫传统的民族价值观,性别被工具化,体现了该党女性民族主义逻辑。

四、瑞典民主党的成功:一个移民政治的分析框架

自2010年选举取得突破以来,瑞典民主党在政治格局中就开始站稳脚跟。有学者指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成功最终取决于移民问题的框架”。^① 框架可以被视为一种“解释性图式,它通过有选择地标注和编码一个人现在或过去环境中的对象、情境、事件、经验和行动序列,来简化和浓缩‘外面的世界’”^②。“移民问题的突出,以及大多数西欧国家支持仇外观点的事实,作为一个动员因素和催化剂,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非常重要。”^③ 正是因为移民问题使反移民政党具有更大的知名度。从移民政治视角来审视民族、排外、性别、媒体等问题,是理解瑞典民主党成功的重要分析框架。

(一) 民族主义政治:文化与种族

瑞典民主党崛起的主要解释之一就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复苏。民族主义是以“国家”为共同参照系的社区凝聚力的象征,是多元模式下文化或民族分化过程的固有组成部分,它旨在将民族具体化和自然化为自然和常识性的东西,正是民族主义定义了国家,而不是相反。因此,“民族国家成为社会团结最重要的组织实体之一,因为它提供了政治认同和社会道德的基础”^④。瑞典民主党人秉承生物种族主义和文化民族沙文主义,在1989年的党纲中反对形成多元文化的国家,并提倡保护瑞典作为“一个种族和文化上同质的国家”,强调“祖国”和“民族”等概念的重要性。^⑤ 该政治纲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他们将自己视为本土内群体,而移民则被视为域外群体。这表明,“与民族主义主题产生共鸣的大众仇外心理和民族中心主义已变得越来越普遍和重要”,^⑥ 正如库普曼斯(Skoopmans)所言,全球化使许多人丧失了身份,由于除了民族国家之外,没有什么能成为集体认同的新锚,人们转向民族主义来寻找这种锚。^⑦

瑞典民主党也被认为是一个种族主义政党。“种族既是自我认同的一种属性……也是一种基于群体互动和政治动员的集体现象。”^⑧ 种族主义的概念旨在强调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及其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结构,并有助于理解传统的生物种族主义和不断变化的种族主义形式。种族化过程的一个中心特征与移民有关,或至少通过移民起作用。如果说民族主义构建了一个虚构的政治和文化集体的身份,那么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则定义了这个集体身份的一方,即那些被认为不是国家的一部分的人。种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内部的补充”,“种族主义不断出现在民族主义中

① Albana Shehaj, “Immigration and Right-wing Populism: An Origin Story”, *Party Politics*, vol. 27, no. 2, 2021, pp. 282 – 293.

② Aldon Morri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37.

③ Jens Rydgren, “Voting for the Radical Right in Swedish Municipalities: Social Marginality and Ethnic Competitio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vol. 34, no. 3, 2011, pp. 202 – 225.

④ Steffen Mau, “Migration and Welfare State Solidarity in We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vol. 19, no. 3, 2009, pp. 213 – 229.

⑤ Eirikur Bergmann, *Nordic Nationalism and Right-Wing Populist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69.

⑥ Gabriella Elgenius, “Frames of Nostalgia and Belonging: the Resurgence of Ethno-nationalism in Sweden”, *European Societies*, vol. 21, no. 4, 2018, pp. 583 – 602.

⑦ R. Koopmans, *Contested Citizenship: Immigr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Europe*, Minneapolis: Univ. Minn. Press, 2005, p. 5.

⑧ John Downing, *Representing “Race”: Racisms, Ethnicities, and Medi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5, p. 14.

(……)民族主义产生于种族主义”。^① 瑞典民主党的文化和生物种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国家观念和实践的改造,是种族主义的变体。在一个移民和全球化的时代,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极易出现民族主义议程的政党,它们强烈反对“多元文化政策”,支持减少移民的措施,以促进“社会凝聚力”。而瑞典民主党的选举结果与国家的移民人数是正相关的。

(二)排外政治:保护边界与人民

在一个具有仇外倾向的国家,如果建立了一个政党组织来利用这些意见,那么这个政党在比例代表制中更有可能在“选举市场”中取得成功。瑞典民主党很好地利用了民众的恐惧、愤怒、不满、沮丧等排外情绪,促进了自身的成功。极右翼政党通常被理解为“反移民政党”和“排斥运动”。而欧洲难民危机后,移民问题的突出性,加上大多数西欧国家支持仇外观点的事实,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其作为动员因素和催化剂是很重要的。瑞典民主党声称自己是人民的真正代表,并发誓要保护边界和人民免受难民的入侵。该党相信,在一个基于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世界,其中领土边界突出了特定国家的地理区域,因而加强国家构建很重要,并指出,“在我们瑞典,瑞典被允许只是瑞典,它的居民被允许只是瑞典人”^②。该党认为精英们对全球化和移民的偏好威胁到普通民众这些国家“内群体”的利益,福利、文化和自治受到全球化、欧洲化和移民这些外部威胁的挑战,并由此产生了保护边界和人民的排外修辞话语。

事实上,瑞典的民族认同是将“人民”的概念与民主福利、现代化融合到国家之中。瑞典民主党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将自己保护土著居民的民族主义议程与围绕“人民”的民族浪漫概念“人民之家”(Folkehemmet)的隐喻联系起来。人民之家本质上包含瑞典的民族认同,暗指民主、人民、民族三位一体,它为所有瑞典人建立一个同质的政治体系和民族社区,将保护边界和所有公民,强调“把我们自己的人民放在第一位”^③。移民被视为一种威胁,因为个人的身份部分基于种族和或文化相似性。共同的传统、神话、文化和血统被视为社会“团结一致”所可取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充满焦虑和恐惧的全球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在旧的当地文化中寻找安全感。瑞典民主党将本地居民和被视为对瑞典民族生存构成威胁的外来者之间进行明确的划分,展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移民立场,其结果导致一种恶性的排外政治循环,即“排斥产生更多的排斥,排斥文化传给后代”,以及“最初作为结果的排斥——变成排斥原因”。^④

(三)恐惧政治:反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所谓恐惧政治,指所有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将某种种族、宗教、语言、政治上的移民和少数群体作为“替罪羊”工具化,将大多数的不幸归罪于他们,并把他们建构成一群可能威胁、危害“我们”和“我们国家”的存在。这些威胁源于对变化、全球化、福利丧失、性别角色变化的恐惧。诺里斯(Norris)解释说:“恐惧政治推动了部落寻求集体安全——即使这意味着牺牲个人自由。”^⑤事实上,建构“恐惧”为瑞典民主党提供了一种最有效的修辞手段,那就是为所有社会问题找一个替罪羊,并借机将其政策提案合法化。正如艾伦·普雷德(Allan Pred)所指出的:“欧洲的流行情绪越来越

① Étienne Balibar,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Verso, 1991, p. 54.

② Johan Nordensvard, “Nationalist Reframing of the Finnish and Swedish Welfare States-The Nexus of Nationalism and Social Policy in Far-right Populist Parties”,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vol. 49, no. 3, 2015, pp. 356 – 375.

③ Michael Hamelers, “Putting Our Own People First: The Content and Effects of Online Right-wing Populist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 22, no. 6, 2019, pp. 804 – 826.

④ Magnus Dahlstedt, “The Politics of Making Demands: Discourses of Urban Exclusion and Medialized Politics in Swed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8, no. 2, 2015, pp. 101 – 117.

⑤ Poppa Norris, “Muslim Integration into Western Cultures: between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Political Studies*, vol. 60, no. 2, 2012, pp. 228 – 251.

倾向于将经济衰退和资本主义调整导致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失业、住房短缺、青少年犯罪增加、社会服务不足——归咎于缺乏‘我们的’道德和文化价值观的移民。”^①穆斯林被描述为国家威胁，它破坏了民族文化、社会福利和团结。

瑞典民主党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难民和穆斯林人口上，并在文化问题上持专制立场。该党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最大的威胁就是对伊斯兰教的接受，伊斯兰教代表了终极的他者，是对瑞典文化、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威胁，因为它们与国家核心价值观不相容，也最不倾向于同化。伊斯兰文化常被描绘成落后、低劣的文化，这种言论标志着一种更为等级化的种族主义的回归。对此，马蒂亚斯·埃克曼(Mattias Ekman)指出：“移民文化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人们只是对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表现‘真正’的恐惧。”^②在该党的文件中，穆斯林信仰与伊斯兰主义(作为极端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毫无区别地联系在一起，使人们狭隘地将不太理想的移民认定为穆斯林移民。“瑞典民主党的发言人不断将穆斯林描绘成小偷、厌恶女性者、强奸犯和恐怖分子”，^③这导致更多人呼吁抵制这些移民带来的影响，并要求严格限制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正如该党领袖奥克松所强调的：“瑞典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是我们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外国威胁。”^④

(四) 媒介化政治：营销与塑造

新闻媒体在瑞典民主党的崛起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移民问题”让瑞典民主党在主流媒体和网络空间有了更大的知名度。该党通常利用媒体传递民粹主义信息、营销反移民观点、动员选民等，以此影响和塑造公众对移民的看法和态度。正如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所说：“新闻媒体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读者去思考什么方面却非常成功。”^⑤媒体有关移民的新闻常以犯罪和威胁叙事为主，公众感知到的威胁、恐惧和种族仇恨与媒体对瑞典民主党的关注相互作用。换句话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民认为移民和欧盟具有威胁性，当媒体经常提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时，他们可能会觉得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并且媒体的关注与个人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同情呈正相关。媒体报道有助于提高合法性以及知名度，这对缺乏经济资源的新政党至关重要。媒体对瑞典民主党人的关注度在过去二十年里大幅提升。

在瑞典，激进右翼立场“主流化”的趋势正在出现，新闻媒体反移民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它们为极右翼者挑衅性的政治风格提供话语空间和公众知名度，并通过融入问题、话语元素，使移民对国家价值观和文化构成“人口威胁”的观点广泛传播，促进公众接受宣传的所谓解决方案。由于围绕难民危机的公众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体传播的图像和框架告知而形成的，媒体将移民描述为对原住民的威胁的信息在接收者之间很容易形成一致的图式。此外，瑞典民主党还广泛使用社交媒体和在线报纸这些“另类媒体”，来抨击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正确性”以及伊斯兰教的威胁。在2014年瑞典大选期间，“意识形态边缘化的政党倾向于在新媒体领域获得比老牌媒体策划的报道更多的吸引力”^⑥。2015年难民危机后，瑞典民主党通过媒体强调危机社会和

① Allan Pred, "Somebody Else, Somewhere Else: Racisms, Racialized Spaces and the Popular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Sweden", *Antipode*, vol. 29, no. 4, 1997, pp. 383-416.

② Mattias Ekman, "A Populist Turn? News Editorials and the Recent Discursive Shift on Immigration in Sweden", *Nordicom Review*, vol. 42, no. S1, 2021, pp. 67-87.

③ Per-Erik Nilsson, "Shame on the Church of Sweden: Radical Nationalism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ontemporary Sweden", *Critical Research on Religion*, vol. 8, no. 2, 2020, pp. 138-152.

④ Diana Mulinari, "We are Sweden Democrats Because we Care for others: Exploring Racisms in the Swedish Extreme right",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vol. 21, no. 1, 2014, pp. 43-56.

⑤ Bernard Cecil Cohen,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3.

⑥ Ralph Schroeder, *Social Theory after the Internet: Media,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UCL Press, 2018, p. 68.

崩溃社会的概念,使其获得了公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对此,瑞典学者杨特莎娃(Yantseva)指出,“社交媒体为表达种族主义和右翼话语提供了平台”^①。

(五) 父权政治:性别与身体

瑞典民主党的反移民立场还因父权政治和男性统治而闻名。该党植根于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提倡传统的性别角色并强烈反对女权主义,反对堕落、色情、一夫多妻制、同性恋,以确保纯种族血统。其中,在瑞典白人男性特征的构建中,优雅、体贴、坚定、自信等形象十分清晰,而相比之下,种族化的男子被描绘成态度咄咄逼人,习俗原始粗暴。该党通过主题、话语策略和词汇结构在诸如性别(男性特征)、社会阶层(精英)、性(异性恋)和种族(白人特征)等问题上阐明理想化的白人男性特征。在该党的解释中,国家、家庭被描绘成一种等级结构,将男性主导地位自然化,而女性则屈从于妻子和母亲的地位。这些隐喻性话语揭示了该党父权制逻辑。在该党民粹主义话语中,维持性别化的社会等级制度和两性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是通过“伪解放性别政策”得以解决的,这也被称为“性别民粹主义”。也就是说,“性别平等被作为种族化移民的一种划分和从属,被描绘成对妇女权利及其身体完整性的威胁”^②。

瑞典民主党的家庭隐喻是一种深刻的性别结构,其基础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支配和控制。“它将男人视为保护者,视为捍卫依附的‘妇女和儿童’的绅士,视为妻子和儿女的监护人,视为确保瑞典社会有效运转的有远见和合法的政治家和专家。”^③换言之,在现代父权制背景下,这种等级制度还有一个种族化的维度,它将男性化同化为白人,被理解为霸权的“常态”,而女性化则与种族差异相联系,从属于“特殊性”。因此,移民家庭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要么他们是严格的传统和父权制的,要么他们是缺席的,瑞典妇女可能成为移民男子父权制和暴力的牺牲品。事实上,两性平等在瑞典民主党的关键政策文件中没有具体位置。此外,两性平等话语带有种族特征,它将移民排除在两性平等概念之外。该党关于两性的主张体现了其传统家庭价值观、保守的道德态度和社会规范、传统父权主义和父权制逻辑。其结果是,“借助男女平等这一女权主义政治曾力图实现的目标似乎构成了瑞典民主党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④。

五、总结与展望:瑞典民主党走向主流化和排外常态化

近年来,各类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很多欧洲国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主流政治力量,并在选举中呈现登堂入室之势。事实上,他们的成功既不是偶发性的,也不仅仅是抗议的表现,而有着其“制度环境、对反移民政策的需求、提供反移民政策的政党的供给,以及老牌政党的问题策略”^⑤。曾作为欧洲激进右翼民粹主义“特例”的瑞典民主党,利用民族主义倾向,保护福利国家的高涨的反移民情绪和移民问题政治化等有利条件,推行反移民政策和民粹主义策略,最终获得选举的成功。这一结果标志着瑞典作为欧洲“例外论”的终结。在不断坐大,从边缘化走向主流化的道路

^① Victoria Yantseva, “Migration Discourse in Sweden: Frames and Sentiments in Mainstream and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 Society*, vol. 6, no. 4, 2020, pp. 1–16.

^② Ov Cristian Norocel,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White Nordic Masculinities in Right-wing Populist Media”, *Men and Masculinities*, vol. 23, no. 3–4, 2020, pp. 425–446.

^③ Ov Cristian Norocel, “Give Us Back Sweden! A Feminist Reading of the (R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olkhem Conceptual Metaphor in Swedish Radical Right Populist Discourse”, *NORA—Nordic Journal of Feminist and Gender Research*, vol. 21, no. 1, 2013, pp. 4–20.

^④ Ov Cristian Norocel, “Give Us Back Sweden! A Feminist Reading of the (R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olkhem Conceptual Metaphor in Swedish Radical Right Populist Discourse”, *NORA—Nordic Journal of Feminist and Gender Research*, vol. 21, no. 1, 2013, pp. 4–20.

^⑤ Carl Dahlström, “The Immigration Issue and Anti-immigrant Party Success in Sweden 1970–2006: A Deviant Case Analysis”, *Party Politics*, vol. 19, no. 2, 2011, pp. 343–364.

上,瑞典民主党的核心思想是民族主义或本土主义与反建制民粹主义的混合。它通过回归传统价值观、保持文化和民族的同质性,依附于父权制和沙文主义,为选举的突破提供了可能。

移民是所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动员选民时所使用的核心问题,对移民的深刻怀疑是民粹主义政党成功的主要原因。对此,彼得森(Pedersen)指出:“如果难民和移民问题成为政党竞争的核心,极右翼政党往往可能是选举中的主要赢家”。^①事实上,移民比例与瑞典民主党的选举支持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该党将移民作为替罪羊,煽动民众对伊斯兰的恐惧症和仇恨,并呼吁将加强边境的移民监管作为政治战略举措。该党通过基于利益的威胁(经济和安全威胁)和基于身份的威胁的呼吁,形成主流人口和移民对抗性观点,促进反移民态度的形成。正如迪·皮亚扎(Di Piazza)所言:“移民在当代政治制度中越来越多地被武器化。”^②当主流政党采用模糊的移民立场和政策时,而瑞典民主党却以影响选民优先事项和政策偏好的方式构建它,并在公共话语中将其政治化。

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移民,尤其是弱势移民群体,往往成为这些西方国家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显性承载者,而非问题的始作俑者。“移民问题被认为是重要和突出的,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它“并不会自动导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③瑞典民主党的崛起更深层原因是西方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深刻变革的结果,这也是整个西方社会既定亚文化、环境和制度等正在被侵蚀和摧毁的隐喻,具体表征为:现代化和社会边缘化、经济危机和失业、政治上不满与异化、政治认同和阶级投票下降。此外,主流政党政治空间和意识形态趋同,主流政党话语的僵化和其所谓的主流价值观与民众实际利益诉求的矛盾,民众对欧盟普遍存在的怀疑和消极态度,等等,都为瑞典民主党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有利的政治机会结构。

总之,瑞典民主党已经通过大选跳出被人轻视、嘲讽的政治边缘,一跃上升为主流政党。它的崛起使瑞典政局空前复杂。一些传统主流政党为了留住选民,也不得不进行转型,吸纳曾被抵制的民粹党的方案。其示范效应还波及整个欧洲。正如皮纳尔(Pinar)所言,民粹主义在意识形态、框架、策略、结构和机会等方面产生溢出效应,这意味着主流政党也会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④霍根(Hogan)进一步指出:“右翼民粹主义团体通过推动国家对话向右转,对各自国家的主流政党、公共政策和更广泛的社会话语产生了重大影响。”^⑤范斯潘捷(Van Spanje)发现,欧洲主流政党在移民问题上可能效仿瑞典民主党。^⑥当前,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移民问题也正成为热门竞选议题。种族主义、疑欧主义、仇外情绪在整个欧洲正呈现“正常化趋势”。“如今,各式各样的右翼民粹主义在许多欧洲国家和欧洲之外已经成为主流的政治力量。”^⑦

当然,瑞典民主党要想真正摆脱“贱民党”地位,仍然面临着诸多“适应性困境”。如主流政党

^① 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 “Immigration as a Political Issue in Denmark and Swede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7, no. 5, 2008, pp. 610 – 634.

^② G. Napoli et al. (eds.), *Values, Cities and Migrations, Green Energy and Technology*,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3, p. 34.

^③ Jens Rydgren,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Denmark and Sweden: Explaining Party System Change and Stability”,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0, no. 1, 2010, pp. 57 – 71.

^④ Pinar Dinc, “Mapping Populism: Definitions, Cases, and Challenges to Democracy”,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ipc.sabanciuniv.edu/wpcontent/uploads/2016/10/IPM_MappingPopulismReport_28.10.16_web.pdf.

^⑤ Jackie Hogan and Kristin Haltinner, “Floods, Invaders, and Parasites: Immigration Threat Narratives and Right-Wing Populism in the USA, UK and Australia”,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vol. 36, no. 5, 2015, pp. 520 – 543.

^⑥ J. Van Spanje, Contagious Parties: Anti-immigration Par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other Parties’ Immigration Stances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Party Politics*, vol. 16, no. 5, 2010, pp. 563 – 586.

^⑦ [奥]露丝沃·达克著,杨敏译:《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话语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页。

全方位的集体抵制使瑞典民主党问鼎政坛困难重重,两极分化的价值观使瑞典民主党和主流政党陷入本土对立困境,反移民言论和政策可能导致社会分裂,加剧族群对立,损害社会凝聚力,以及强硬的反移民政策可能使其外交上面临人权组织和移民来源国的指责等。此外,当瑞典民主党上升为主流政党和成为政府的一部分时,新的困境是如何在继续主张移民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的同时,争辩说他们实际上设法解决了它;瑞典民主党上台以后是与否趋向务实?这些仍有待观察。但可以预见的是,民粹主义活跃在瑞典政坛的局面将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安德斯·维德费尔特(Anders Widfeldt)所言:“随着该党的不断变化,老牌政党将不得不决定是将其视为弃子还是予以接纳。新民主党虽然只是暂时的现象,但瑞典民主党并非昙花一现,不会轻易消失。”^①

Abstract Today, the rise of racially charged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regions reflects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and the West, exerting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global political trend. Immigration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explaining the rise of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Sweden, issues relating to immigration and race are becoming part of the ideology and mainstream discourse of radical populist right-wing parties. Electoral results in recent years have shown that the Sweden Democratic Party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political force in the country, securing sustained electoral success through nationalist and anti-immigration political strategies. These strategies rely heavily on narrow notions of nationalism, which label outsiders as “scapegoats” of social problems, while “race”, “immigrants”,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have given rise to xenophobic ideology or discourse that reflects and caters to rising anti-immigration sentiment among domestic public. In fact, the success of the Sweden Democratic Party depends on managing and hyping the immigration issue. Driven by new dynamics and problems of immigration in Sweden, nationalist politics, xenophobic politics, fear politics, media politics, patriarchal politics, emotional politics, etc. are integrat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mmigration. The rise of the Sweden Democratic Party is also part of a wave of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a metaphor for the trend of “mainstreaming” and “legitimizing” right-wing populism across the West.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conjugate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migration issue and the rise of the Sweden Democratic Party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countries today.

Keywords Immigration Right-wing populism Nationalism Sweden Democratic Party

(陈文胜,教授,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绵阳,621010)

[责任编辑:黄凌翹]

^① Anders Widfeldt, “Party Change as a Necessity – the Case of the Sweden Democrats”, *Representation*, vol. 44, no. 3, 2008, pp. 265 – 276.